

论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的 “葛兰西转向”

段吉方

内容提要 “葛兰西转向”是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葛兰西思想发生深刻的理论融通的结果。在转向葛兰西过程中,英国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歧与困境,产生了一种“葛兰西式文化研究”,它既是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折,又体现了不同理论模式间丰富的思想张力和实践影响。

在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①理论具有不可轻视的理论影响与启发,它在与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E. P. 汤普森等理论家的思想的理论融通中促发了 70 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转向”既体现了葛兰西思想广泛的理论渗透力,同时也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接受能力与思想重组能力。“葛兰西转向”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有着长期的重要影响,不但促发了英国文化研究理论重心的转移,而且引发了对文化研究理论传统的反思。正是在接受葛兰西思想的过程中,英国文化研究开始走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分化和矛盾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文化与社会权力的组合关系上来,从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等因素的复杂关系中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本文试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问题,以期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提供一种阐释和理解的思想路径。

一 阿尔都塞思想的落潮与葛兰西 思想在英国的接受

在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主要体现于

他 1948—1951 年先后出版的《狱中札记》。葛兰西总结了意大利、德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经验和历史教训,专门研究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历史和现实以及社会的阶级构成、历史文化问题,并对无产阶级如何培育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及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如何建立政治领导权问题作出了深入的阐释。葛兰西提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于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可以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形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②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套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而且包括了更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统治阶级赢得普遍的价值认同的过程。而“文化领导权”涉及的正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或集团如何才能不依靠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权力控制,而通过某种引导方式在一个充分发展、成熟的市民社会获得普遍价值认同的问题。

葛兰西的理论思考与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演进和文化突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他的“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

等一系列有鲜明针对性的理论观念，不但充分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批判性的理论价值，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而且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集体性的理论重读。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里·安德森认为，《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③，“西欧再也没有其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达到过同样的造诣”^④，在葛兰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之外开始“用自己的密码式的语言来说话了”^⑤。这其中就包括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对它的思想接受以及深刻的理论融通。

葛兰西思想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引入英国文化研究的，它的引入首先是西欧社会文化发展历史中阿尔都塞理论危机的结果。20 世纪 60 年代，在左派文化高潮的时期，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思想曾经在欧洲文化理论界有着显著的影响。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内在的结构特征，他提出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决定”思想和“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三元关系”理论，不但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而且在学理层面上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代发现了意识形态介入文学生活的机会，但是几乎没有写下可以适应更普遍的论题的文字”的历史时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最有雄心的理论探险”^⑥。威廉斯、霍尔、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 20 世纪英国文化理论家都曾经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伊格尔顿的早期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基本上是在阿尔都塞的理论计划上完成的。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霍尔等人也认识到，社会文化的构成不仅仅是社会生产组织中各种文化要素以及社会个体的自觉建构，文化研究在面对个体经验的过程中其实也面临着社会整体结构建构的现实，因为个体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构成物，而且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经验、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这种观念启发了霍尔等人运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念深入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领域，探究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和表现形式，推动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

理论范式的形成。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变，特别是随着英国“撒切尔主义”^⑦的兴起以及法国 1968 年革命的落潮，西方文化左派一直以来为之努力的激进思想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势下，文化研究理论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或是被迫地向右转，或是玩世不恭地痛恨早年幼稚的理想主义，更有一小撮知识分子在最微弱的希望中继续探测革命的未来”^⑧。在左派文化遭受严峻危机的时刻，由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内在结构性特征以及学理上的建构色彩，面对不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以及不断扩大的审美与文化研究领域，它日益显现出了批判性分析复杂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功能的弱化，也显出了那种在学理上来自结构主义观念的批评方法的简单化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威廉斯、E. P. 汤普森、霍尔、伊格尔顿等纷纷发表意见，不同程度地对阿尔都塞理论产生怀疑甚至批判。伊格尔顿在《反本质》中提出，阿尔都塞思想是一种“伴随着理想主义的政治耗损和断裂而出现的文化理论”，阿尔都塞求寻以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一种纯粹的、原始的、高尚的、未被各种各样的革命污染的状态，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状态中思考马克思主义”^⑨。E. P. 汤普森更是发表了批判阿尔都塞的著名论文《理论的贫困》，认为阿尔都塞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剔除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实践过程，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抽象化的理论范畴，他所确立的社会结构概念是唯心主义的。^⑩他们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曾经引发了“英国左翼学术界之中的最激动和剧烈的辩论”^⑪，正是在阿尔都塞思想落潮的理论背景下，英国文化研究有了更多地接触域外理论思潮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理论更新与思想掘进的机会。在阿尔都塞思想落潮中，“葛兰西而非阿尔都塞，是被左翼知识分子最热烈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⑫，英国文化研究因此也开启了“转向葛兰西”的重要理论阶段。

二 “转向葛兰西”与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更新

葛兰西思想是在“英国左派危机”、阿尔都塞

思想落潮的理论背景下被引入英国文化研究的,其中离不开威廉斯、霍尔、汤普森等人的理论融通,他们是促发“葛兰西转向”的关键力量。

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认为,威廉斯正是在拥抱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时,才改变了把文化理解为一种被实现的表意系统的方法,并最终“把文化与权力设置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⑬。这正指出了威廉斯与葛兰西思想的微妙关系。威廉斯曾专门讨论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文化理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威廉斯看来,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文化”的概念表明“人们决定并且造就着自己的全部生活”,但这种文化概念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说明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则“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观念、信仰的意识体系,而且还有构成主导性意义和价值的活生生的整体社会过程以及各种文化权力的影响和分配状况,它们不仅渗透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也不仅渗透在明显的社会活动中,而且还渗透在由业已存在的种种身份和关系所构成的整体中,一直渗透到那些压力和限制的最深处”^⑭。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涵盖又超越了此前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文化”;另一个就是“意识形态”^⑮。“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威廉斯文化研究理论的关键概念,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之前,威廉斯不但在《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对“文化”的概念做过系统性的分析,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着独到的理解,但面对葛兰西,显然威廉斯的理论视野更加丰富了,同时也明显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修正和补充。威廉斯看重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作为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的经验性影响,更看到了它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来自生活世界的理论补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更多地从葛兰西思想中摄取了理论的实践性和经验性成分,在更为细致的理论研究中将葛兰西思想有效地融入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之中。

除了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威廉斯稍早时期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973)也是受葛兰西思想影响的

结果。在这篇被称为最早的“威廉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遭遇”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理论基础”^⑯的文章中,威廉斯最引入瞩目的理论突破就是没有重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而是坚持从“文化”的整体性范畴切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逻辑,以经济基础、文化、上层建筑的三元关系代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威廉斯指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⑰但他反对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抽象化,主张在“文化”的物质性和生产性意义上打破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封闭性。在这里,威廉斯展现出了重要的理论变革态势,他试图从文化的历史性与文化的经验性上突破那种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维限定,所找到的理论切入点正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所提供的不同阶层文化经验之间协商建构的理论属性,从而使英国文化研究理论超越了单纯强调阶级性与对抗性的理论路径。

与雷蒙·威廉斯一样,英国文化理论家汤普森和霍尔也对葛兰西思想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深刻的理论融通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1963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就强调采用工人阶级文化研究的历史学方法。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分析,汤普森试图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工业革命等社会现代发展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现代英国社会发展中不断形成其稳定的阶级意识与文化经验的结果。正是工人阶级的文化经验所培育的集体的自我意识,才对工业革命时代的伟大创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汤普森充分强调社会实践之于阶级与文化的建构作用,在英国文化研究正在经受阿尔都塞思想影响的时刻,他没有采用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而是更加靠近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分析方法,这不但为英国文化研究转向葛兰西起到了一种理论策动的作用,也深刻地呼应了他后来在《理论的贫困》中对阿尔都塞思想的深刻批判。

英国文化理论家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曾被称作是“文化研究之父”。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霍尔广泛涉猎了葛兰西思想,并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下综合运用文化分

析、符号学、民族志等方法从事文化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更新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在 1968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和 1978 年的《监控危机》所体现的“编码/解码”思想；另一个则是他独特的“耦合”概念。霍尔提出，传统上的大众传播研究已经在“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线性特征上将信息流通与传播过程概念化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信息与话语流通必须要经过转译或社会实践环节的改造，必须经过“赋予意义”的产品分配检验，“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⑧，因此，“必须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⑨。从这种观念出发，霍尔更加重视编码/解码过程是如何在有效融入社会文化结构中展现信息接受对图像符码意义的结构性拓展的。他提出的问题是，观众如何在主导—霸权、协调符码以及对抗性符码等不同地位上从媒体信息中获取图像符码的意义，并根据图像信息的参照符码完成解码过程。霍尔的理论创造性在于“对葛兰西的创新性阅读”^⑩，他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强调受众在对信息符码的生产、流通、使用以及再生产过程中以多种方式介入文化与权力的运作过程，从而剔除了他的编码/解码思想中的结构主义成分和阿尔都塞思想的残余，并充分考虑到了主导—霸权符码在解码过程中的作用，由此体现出了他对现代传播理论的深刻拓展。

在霍尔的研究中，他积极响应葛兰西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耦合”（articulation）概念的独特性应用上。“耦合”概念并非霍尔首创，但却是经由霍尔充分应用于英国文化实践领域的。^⑪在霍尔那里，“articulation”这个词包含了非常复杂的隐喻含义，它原初的意义来自于某种特殊联动装置的链接形式，比如一种链接式卡车的驾驶室和拖车之间的链接部分所承载的特殊意义。霍尔将这样一种特殊的隐喻含义引入语言学、符号学以及文化研究，从而赋予了“耦合”概念以发声（utter）、表达（expressing）、清晰地说出（to be articulate）等方面的含义。在文化研究中，“耦合”

指向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表意实践行动，指的是社会文化以及语言系统中各种组成要素在某种链动机制的链接下是如何把那些个别性的文化表意符码再现为文化实践活动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话语和符号的总体性统一，是一种将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经验与意识形态经过某种接合机制充分实践化的过程。霍尔在文化研究实践中得以充分应用“耦合”概念，与他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改造分不开。葛兰西提出，“不是意识形态改变结构，而是结构改变意识形态”^⑫，在一个社会中，处于社会主导位置的社会集团建构它的文化领导权并非意味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也并非意味着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文化领导权的构建过程融合了文化与权力机制中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的经验互动，“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整体社会理论关系发生接合性波动的具体表现”^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领导权包含了社会主导阶级与从属阶级文化价值观的“耦合”过程，霍尔正是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将“耦合”的概念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也在霍尔的“耦合”概念上获得了新的理论飞跃。

三 “葛兰西式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与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转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经过了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的努力，英国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哲学方法，充分重视社会文化变革中的大众文化经验，在关注现实审美文化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⑭并引发了安德森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地理位置的转移”^⑮。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深化发展，“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之间也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曾经形象地说明：“在结构主义的视野中，大众文化经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其炮制俨如法律的规则，专横通知大众的思想，一如索绪尔为结构主义提供组构范式的纲领”，“文化主义恰恰相反，

经常是不作辨别地一味浪漫,赞扬大众文化是真实表达了社会受集团或阶级支配的兴趣和价值观”^⑤。“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都围绕着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展开研究,但它们“维持在两个对立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阵营中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者锁定在一场零和游戏之中,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必有所失,游戏的最终目标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从而胜利者得以占据被征服一方的地盘”^⑥。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⑦。威廉斯、汤普森、霍尔等人也正是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歧中开始转向葛兰西。威廉斯正是在接受葛兰西思想后才得以不断反思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隐喻性质,他的每一次修正都“十分有助于对文化研究是什么和应该做什么重新作出界定”^⑧。而在霍尔看来,葛兰西思想为英国文化研究“在讨论‘复杂的结构与上层建筑、独特的形式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中指出了一种道路”^⑨。但无论霍尔还是威廉斯、汤普森,他们在转向葛兰西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走向纯理论化的建构,他们充分扬弃了葛兰西思想中的理论化的成分,而极大地发扬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经验性立场,并在文化研究中将这一新的阐述扩展到性别、种族等文化政治领域,不但促发了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更新,也为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个范式用约翰·斯道雷的话说就是“葛兰西式文化研究”。

“葛兰西式文化研究”有什么样的特征?约翰·斯道雷指出,“葛兰西式文化研究”即是受到文化领导权理论启发的文化研究,它的特征是:“大众文化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由文化产业强加的文化,而是葛兰西所谓的二者间的一种折衷平衡,一个底层力量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混合体;它既是商业性的,也是本真的,既有抵抗的特征,也有融合的特征,既是结构,也是能动的。”^⑩从文化研究角度看,这种“葛兰西式文化研究”强调的是社会文本的被铭写过程以及意义与阐释间的复杂联系,并且始终坚持生产与消费、意义与阐释、文本与铭写的辩证关系,即霍尔说的“表达的耦合”与“连接的耦合”。它

不主张从抵抗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而强调更包容地预想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联系,目的是获得文化领导权这个极具生产力的隐喻。

相比“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葛兰西式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曾指出,葛兰西思想与早期文化研究理论的区别在于:“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如说体现在争夺‘霸权’的斗争。这是说,在统治阶级和主要的被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之间,争夺整个社会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因而也是政治的领导权”^⑪。托尼·本尼特发现的也正是“葛兰西式文化研究”特殊的思想内涵,它为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关键性的理论导向,也为英国文化研究找到了理论突破方向。在“葛兰西式文化研究”中,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积极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与社会生产组织以及社会个体的文化从属形式联系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走向了文化与权力机制中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的经验分析,从而也将“葛兰西转向”引入了一种新的问题形式之中。

四 “回到葛兰西”:“葛兰西转向”的问题形式及其美学意义

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在吸收葛兰西思想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自身的理论传统,而是对本土理论经验起到了扩展和更新的作用。借助于“葛兰西转向”在文化研究中的广泛辐射与影响,英国文化研究在新的思想语境中重新塑造了它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转向”不仅仅是不同理论融通和对话所产生的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形式,同时也是西方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内容,并一直以来处于文化研究的理论核心位置,这正凸显了作为一种问题形式的“葛兰西转向”的理论意义。

首先,“葛兰西转向”提供了一个理论整合的框架,让英国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范畴与理论模式的分析具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形式和方法观念。在转向葛兰西之前,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范式都非常重视

文化与意识形态实践的分析,“文化主义”理论范式扎根于英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广阔土壤,在大众文化经验分析的立场上突出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实践的表意形式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结构主义”理论范式偏重于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内在机制与实践影响的分析,侧重于揭示主导意识形态的内部运行机制,并在这个过程中上升到对某种异化力量的产生过程的批判性分析。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文化主义,“两种理论范式都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的领域是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所支配,此意识形态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性质,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系从外部强加给被支配阶级,尽管成功程度有所不同”^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大众文化研究方式带入了一种积极的关系之中,它将大众文化视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关键场域,在这种新的场域中,大众文化被理解成一个斗争和谈判的场域,即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的协商与谈判、统治集团利益的强加和从属集团利益的抵制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在这种理论思考中,它没有单纯地强调文化的经验分析,也没有局限在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之中,而是更加凸显了文化和权力分析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比重,因此既避免也否定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二元对立,也让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具有了新的理论展开方式。

其次,作为一种“问题形式”,“葛兰西转向”在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并非仅具有方法论的意涵,更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美学理论价值,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的隐喻内涵,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引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理论高潮的再次出现。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葛兰西转向”不是单从思想接受的层面上发生的,而是葛兰西思想有效融入大众文化经验分析的结果,因而对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审美实践空间的开拓具有重要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从社会实践的复杂关系中发现文化与意识形态发展与运作的隐蔽机制,坚持从不同社会文化集团相互协商的文化实践中实现文化的领导权,所以,在“葛兰西转向”中其实存在着大众文化研究的另一种思想空间,这种思想空间不是由文化主义研究范

式所强调的大众文化分析所获得的,也不是由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而形成的,而是由市民社会中的具体文化经验与文化实践所构成的,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有效地发展了这一思想,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理论飞跃。

最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能以东方的俄国革命那样的形式来完成。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葛兰西转向”的理论生发过程则回答了这个问题。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并非是理论阐释和分析的结果,也不是占优势的各种权力结构的意义的强加,而是不同阶级力量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中的协商与联系的结果,这其中虽然也存在斗争与对抗,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已经不完全是那种异己力量的直接争夺,而是表现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普遍利益的一种认同”^⑨。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与东方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形势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不能仅仅强调革命本身的实践力量,更应该关注市民社会的文化体验,重视文化与意识形态机制的不同表现形式。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经验的研究中正是呼应了葛兰西的理论精神,并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构文化与权力的生产与运作机制,它所收获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拓展。

葛兰西认为,一种文化领导权的树立,如果不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权力控制,而依靠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引导而获得,并表现为生活的“权威”和“文化”,那么,文化领导权问题就从一种意识形态走向了一种成功的“常识哲学”,这种“常识哲学”是一种“非哲学家的哲学”,体现了社会主导文化的理论,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心价值的体现。^⑩如果说,作为一种理论转折,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有效调和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在文化研究后期所展现出的矛盾和分化冲突,那么,作为一种“问题形式”,“葛兰西转向”则无疑凸显了文化研究新的思想阐释形式。文化研究面向这种思想阐释空间,才能避免传统附之其上的根本重负,真正走向文化和生活方式研究。在葛兰西离世多年之后,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些学者曾专门总结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

论的政治与文化实践价值,他们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视为一个批判性的思想阐释框架,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但体现了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新的文化实践方式,并认为“如果葛兰西能够在自由的天地中而不是在监狱内进行工作,那他的那些草略成型的或者是力图加以阐释的思想以及那些观点、疑问和怀疑,可能就会找到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⑨。身陷牢狱的葛兰西在铁窗边写作《狱中札记》之时,被迫完成了从政治家到一个单纯的思想者的角色置换,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魅力。我们现在再看《狱中札记》中的葛兰西,理论思维缜密扎实,处处显现着反思现实的深邃,又时时透出理论的自信和思想的威力,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使葛兰西的体验更加深刻,同时也为其后的理论家提供了难得的思想参照和理论启发。但所有这些内容从来没有像在英国文化研究中那样能够自由地发挥作用,一直到今天,它的理论价值和美学启发仍然值得我们作出认真的总结。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号:10CZW006)的阶段性成果]

- ①关于葛兰西的“hegemony”的概念,国内学界有不同的译法,有的翻译成“文化领导权”,有的翻译成“文化霸权”。本文中在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和美学理论术语的意义上使用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采用的是“文化领导权”的译法。
- ②②③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38、292、1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③④⑤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第71、61、4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⑥ [英] 弗兰西斯·姆恩:《英国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孟登迎译,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 ⑦撒切尔1979年5月出任英国首相,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削弱工会力量。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英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加剧,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 ⑧ [英]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⑨Terry Eagleton. *Against the Grain*. London: Verso, 1986, pp. 5-6.

⑩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2.

⑪⑫⑬⑭ [美]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第310、320、207、24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⑮⑯⑰ [英] 约翰·斯道雷:《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徐德林译,第7、108、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⑱⑲ [英] 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等译,第116、11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⑳ [英] 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娇娜译,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辑,第3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㉑㉒㉓ [英]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46、346、55、64—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㉔按霍尔的说法,他使用的“耦合”的概念是从拉克劳《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所发展出来的。

㉕“文化主义”范式得力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理论建构,它坚持文化是“整体生活方式”这一主导性的理论观念,反对刻板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是一种在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深入阐释中分析具体文化经验的理论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则是在阿尔都塞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偏重于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内在机制的结构分析。“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形成标志着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步。

㉖ [英]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第24页,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㉗㉘㉙㉚ [英] 托尼·本尼特:《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见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61、61、63—64、61、6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㉛ [意]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㉜ [意]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等译,第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